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REN XUE YU DANG DAIZHONGGUO CONG SHU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当代中国丛书

主编 韩庆祥

人学的科学之路

黄楠森 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学研究紧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
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发展。
因而，我们应从生动的社会实践出发考察和反思
中国人学研究得以兴起的历史背景、演变的内在逻辑，
以及它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联系。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当代中国丛书

主编 韩庆祥

人学的科学之路

黄楠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学的科学之路/黄楠森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当代中国丛书/韩庆祥 主编)

ISBN 978 - 7 - 215 - 06398 - 3

I. 人… II. 黄… III. 马克思主义 - 人学 - 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138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数 336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6.00 元

总前言

发展中的当代中国人学思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就是人学研究的兴起,并且已经形成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人学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研究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因而,我们应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出发,来考察和反思我国人学研究得以泛起的背景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从中进一步弄清人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我国人学研究加以清理和总结。

一、背景——任务——实质

人学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人学研究的任务和实质就蕴含在这一背景之中。

人学兴起的哲学史根据。在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人”面临两种命运:一是人主要被淹没在自然、社会及宗教中,显得不独立;二是人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加以肢解,变成支离破碎的人。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先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再到现代西方

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把人本身从对自然、社会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进而把人学推到哲学的前台;另一方面,先是由马克思提出追求完整的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试图建立完整人的概念,把被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人作为整体的人被哲学加以强调。这种变化蕴含这样的道理:人在世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本质,而且还是使外部世界化为人的世界的主体,因而,哲学不仅要从外部世界理解人,还要从人自身的内在固有方面去认识人,这种认识是在为一切存在提供最终根据。由是,人学便是哲学的本质学,这种本质只是在当代才真正显示出来。实际上,历史越往后发展,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既然如此,当代哲学就应该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专门或主要的研究对象,确立一种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推动哲学的发展。

人学产生的科学史根据。近代以来,关于人的各种科学独立发展起来,积累了关于人的丰富的实证知识。但是,它们在开始时并不一定确保其内在联系,反而使人这一对象变得支离破碎。这不仅没有使我们接近对人的认识,反而使我们远离这一目标。对人的不同侧面加以认识而形成一系列的人的科学,是近代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科学发展到现代,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是整个科学及分支科学之间发生新的相互联系恰恰在人的身上;二是研究人的各门科学及其不同角度趋于结合,趋于综合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把人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和反思,必须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基础学说,来把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既克服对人的片面研究的局限,又为一切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根据这一要求把已经积累起来的有关人的认识成果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回答这样一种本质性的问题:在这些成果的根本底上,人究竟是什么。这就必须建立一门新的人学。

人学泛起的文化学根据。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主要理解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主要理解为只

有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存在的人。这两种文化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某种社会危机,其危机实质上就是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这就提出以文化综合创新来克服以往文化之历史局限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求和重建一种新的完整的人性,并通过这种重建来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

人学兴起的时代或实践根据。真正的人学是时代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 20 世纪,有四个基本事实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是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给人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三是 20 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挫折并陷入低潮;四是西方共同精神的瓦解。在当代中国,有三个基本事实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利用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市场经济的表层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的问题。二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提高国民素质,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从哲学高度和深层来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发展的元价值在于追求人的发展。虽然中西方所提出的问题在层次上不同,但把这些问题提升到人的社会意识中来,核心都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问题,或者必须建立一种专门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来为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就是人学。我们今天生活在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格外突出和尖锐的时代,也面临着各种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尤为迫切重要。人是一切活动和关系的主体,人创造他的历史和存在。人造成怎样的存在取决于他如何做和做什么,人的未来也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而人如何做和做什么,如何选择和决定,又取决于人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在对人是什么、人应是什么和人如何做这些问题的反思、追问及回应中,蕴含着人学产生的必然性。

由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和关注人学,就不会深刻理解和关注这个时代。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任务和实质就是:作为哲学形态走入哲学研究前沿;作为学术思潮关怀人的生存发展;作为新兴学说建构完整人的图景;作为新哲学观考察视角发生转换。

二、进程——主题——观点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萌发、生长和长果三个阶段。

(一)萌发阶段。“伤痕文学”的崛起及其对“文革”的反思、真理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共同促发了1979年后以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性、阶级性和共同人性”、“社会主义和异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三大问题上。其思路主要是从价值观、伦理学角度对我国“文革”十年中的非人性现象作人道主义的评判,其实质,是从哲学人性论上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场讨论的最大成果,是认识到要把人当人看,应对“人”及人性这一曾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加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应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

(二)生长阶段。“把人当人看”,意味着要进一步揭示作为主体人的价值,从理论上说清人的主体性。1984年,我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它要求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是1985年开始讨论人的现代化问题。人的现代化,在当时首要就是人格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必然与传统文化变革联系起来。围绕“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这一主题,当时许多学者集中讨论六大问题:价值观念变革;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与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康人格；人的思维方式变革。这种研究的根本特征，就是人们多从文化的角度反思现实以及人被失落的文化原因，注重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其实质，是从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反思文化与人格，从“文化与人”的关系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确立“新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这种研究的最大成果，是意识到必须把人当主体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人”相对独立出来，对人本身进行专门深入的理论思考；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包含对人的素质、人格、人才和新人的设计。其次是1987年左右开始讨论人的主体性问题。当时哲学界集中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哲学上说清人的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二是人的自觉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三是选择论和决定论的关系；四是个人及其个性。人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之重要特征，就是人们多从历史观进而从本体论再从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角度提出人及其主体性问题，将人的问题引到了哲学本体论和哲学体系之中。其实质，是从哲学原则上反思人的主体实践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并从人的主体性发挥状况方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启示人们正确理解和发挥其主体性。其最大成果，就是人们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是最根本的人性，是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因而人的主体性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要从理论上说清人，就不能不抓住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核心。这里，由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进而使人们走向对人本身的关注，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引发某些学者率先思考人学的问题。于是，从1988年起，国内少数学者率先提出“人学”的问题。

（三）长果阶段。对人学真正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始于1990年。那时，许多对人的问题研究有年的专家学者感到有必要把“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以建立一门新的人学。这一阶段，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根本问题上：

1. 哲学和人学的关系。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包括人学，但不等于人学，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二者是整体和部分

的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哲学发展的方向是“类哲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哲学在一开始并不就是人学,人学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

2. 人学的对象。人学研究完整的人,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如何理解完整的人上出现了分野。一种观点认为,人学研究的是人的完整图景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学是研究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学是研究个人、群体、人类三者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3. 人学概念及其性质。有的学者指出,人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一切科学,狭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它具有哲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人学是一种新世界观和哲学观,“人学”概念的提出代表一种新的哲学观念,一种体察世界的新视角。多数学者认为,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人的某一侧面而形成的一个学科群,人学则是在综合各门有关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形成完整的人”是综合人学,具有综合科学的性质;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一般理论”是哲学人学,它是人学最高、最根本的层次,具有哲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人的认识只能是历史性的认识,只有历史性地看待人的存在和人的自我认识,才能为科学的人学奠定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人学实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学研究组织、团体和学术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人学研究队伍;有些地方积极编写人学教材,开设人学课程,招收人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承担国家及地方人学研究课题。

三、总结——特征——走势

中国的人学研究在 1997 年、2001 年、2006 年呈现高潮。综而观之,30 年来的中国人学研究呈现出这样的整体图景:

研究的界域——人学不是把一切与人有关的问题都纳入进来,也不能被唯物史观所取代,更不等于倡导抽象人道主义,而是在综合和提升各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门以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科学,这门科学应克服抽象人道主义的局限,达到对人的完整的科学理解。

在人学与人的科学的关系上,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避免把人学泛化。近年召开的许多人学研讨会和发表的诸多人学论著,大都首先注意确定人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些对人学研究比较陌生的同志认为,人学就是研究与人有关系的学问的总称,这是一种模糊认识。澄清这一模糊认识的关键,是要把人学同人的科学区别开来。人的科学指的是研究人的某一方面的各门具体科学以及由此组成的学科群,“凡是研究与人有关系的学问”实际上属于“人的科学”的范畴,不属于人学范畴。人学,正如日本的细谷贞雄强调指出的,它所包含的意思与人的科学有别。人学之被倡导,其理论上的动机无非是把已经积累起来的、与人有关的知识由某一统一的原理重新加以组织,从而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把握。近年我国兴起的人学,其深刻的学术动机之一,就是综合和提升各门人的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知识,以达到对完整的人的理解,形成一门新的科学。这里,人学研究实际包含两个层次的基本内容:一是综合人学,以达到对“完整人”的研究;二是哲学人学,从完整的人中提升出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哲学理论,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发展规律范围内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学者对各门人的科学了解不多,对如何综合各门人的科学的知识

和方法知之甚少,对综合人学的研究稍显底气不足,缺乏人学的“学科”意识。

在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既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已经是关于人的十分完备的学说了,没有必要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苏联的格列柯夫和 H. A. 斯捷潘年也持这种看法。有的学者虽承认人学的相对独立存在,但认为它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上述两种观点都否认人学从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相对独立出来的可能性。我认为,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可能的。这可以从三层意义上来论证:其一,如前所说,人学有其明确而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二,人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同后者区别开来。人不等于人类社会,人也不能完全被社会历史所溶解和淹没,人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人是不能完全被社会历史所说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对象,它侧重研究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是人的现实,它为达到具体而由人走向现实,它并不研究完整的人,人学则专门以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二者不能互相取代。其三,人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马克思批判唯心史观和创立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的重新科学理解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在把人的本质看做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在对有生命的个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才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看待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只有在人的劳动中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锁钥,故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显然,只有在对人及其本质加以科学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唯心史观首先是在其理论前提——对人的理解上失足的。既然如此,人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历史问题,以对人的科学理解为首要任务的人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近年我国人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一定进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把人学看作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

义的一门科学,而有的同志之所以看不到人学研究的深刻意义,就是因为忽视了人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当然,人学虽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它必须以后者为指导。

在人学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研究人学就是研究和宣扬人道主义。按照这种认识,人学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了。这种模糊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讨论影响而形成的。在这场讨论中,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并且企图用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去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性的异化,因而是违背人道主义的。这种观点当时被称为精神污染。这一定论至今仍影响一部分人,以致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人学研究是在倡导人道主义。这是对人学研究的一种严重误解。其实,人学研究虽包括人道主义研究,并在价值观意义上对人道主义加以某种肯定,但二者毕竟不同:人学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门科学,而人道主义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关系的一种评价,是一种价值观;人学包括人道主义,但不归结为人道主义。实际上,我们所要建立的人学,恰恰是为了通过对人的完整科学理解以克服抽象人道主义对人加以片面错误理解的局限。

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层面上主要研究了人学的前提性问题,在现实层面上主要研究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研究的内容大都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既具有面上的广泛性,又具有点上的高度和深度;不足在于对一些“前提性问题”还未达成应有的共识,对“人的科学”的综合研究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完整的人”还未提供确切的理解,从人学角度重新理解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做得还不够。

实际上,在对既有成果的关系及学科建设上,人学不是抛弃而是要从人学角度重新审视和理解以往有关的哲学成果,并在人学观念框架内加以重新定位。

无论说哲学就是人学,还是说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说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主要是人学,都涉及人学同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

践观、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人学中,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依然存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那不过是与人和人学相关,受人学统摄的存在:本体论是以人为本体的本体论,而人这一本体具有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两个基本内容,这样的本体论之人学意蕴在于:它是一种信仰,以满足人对完满性的信仰和追求;它是一种终极关怀,使人不断实现对现象、现实之局限性的超越,追求终极和永恒的价值,不被世俗功利和当下一时所困扰,不被现象、现实的局限所遮蔽;它是一种客观精神,要求人避免主观臆断,追求客观实在;它是人的一种自我超越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为人提供一种精神、理念、价值、信仰和追求,以克服自我之局限。认识论是以人为目的、以解决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和客观性矛盾为基本内容、以人论为根据的能动的认识论,认识论的深层之最根本的基础和根据是人论,对认识能力、认识限度、认识范围、认识目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式的解答,最终都取决于对人的哲学理解。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这无非是表达人的批判、超越、发展的主体本性,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无非是人认识客体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实践观中的实践无非是人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过程无非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挥过程,因而实践观无非是关于把外部世界改变成属人世界的观点。唯物史观无非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内容无非是从人的能动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揭示和抽象出来的。实际上,哲学研究的既往成果是人学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史基础和思想资料,这些成果既服从于人学的主题,又作为部分因素和思想资料存在于人学之中。人学把新对象、新主题、新问题和新内容作为中心来思考,而这正体现出人学的创新。马克思哲学有自己的对象、主题、问题和内容,所以才称其为马克思的哲学,而以往哲学的合理因素在马克思哲学中是受“马克思哲学”支配的。

研究的方法——大致可概括为“我思”有余“集思”不足,“哲思”有余“科思”不足,“离思”有余“合思”不足。国内的人学研究大多以学者个人独立思考的方式来进行,并未真正采取集体合作和综合研究的方式;大多运用哲学研究的方式,未做详尽的实证研究;对人的问题

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往往是分离的。人学既不应限于对人的科学作综合研究,也不应囿于演绎式的纯学理研究,而要主张以对人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对人的基本理论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深入人的活生生的世界去捕捉时代的课题,既注重从外观即人的对象化的世界方面科学研究人,又注重从内在即对人的内在结构的反思方面研究人。

研究的主体——有些学者往往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对待人学研究,从科学方面和“形而上”方面研究“人”相对注意不够,既“上”不去,又“下”不来;一些学者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有些学者由于对人学研究的背景、实质和意义了解不够,因而对人学作为一门科学不理解,低估人学探索的积极意义;一些学者认识到“人的科学”研究对人学研究的必要性,但对“人的科学”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有些学者立足于当代中国的视野来研究人学,但缺乏应有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综合能力;有些学者多去争论抽象的人学概念,不大追问人学研究的精神实质、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一些学者也在研究人学,但对人学的基础理论缺乏真正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对素质的要求上,人学研究者不能完全被利益、情感、经验、感觉、意志和表象所遮蔽,而必须切实掌握以高级理性为支撑的唯物辩证法。人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是世界上最难理解和把握的对象,要准确把握和理解人,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而要真正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具有高度自觉的理性意识。仅凭自己的利益、情感、经验、感觉、感性、意志和表象来从事活动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做出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事,而这样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人”及人学理论。

研究的立足点——中国的人学研究始终是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支撑下步步深入的,这一环境对学者们思想上的解放作用是巨大的,它使人们由过去“谈人色变”到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由过去把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到现在对此加以科学地研究,由过去排斥人的研究到现在兴起“人学热”,由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人道主义进行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纵深向人学理论建构方向发展,由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到20世纪

90年代深入向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方向发展；中国的人学研究还反映了世界思想文化向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转向的大趋势，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当然，当代中国人学既不是完全重走近现代西方人学发展之路，也不是顺着中国传统文化之路“接着说”，而是立足于当代人类发展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以及对现实中国人的科学理解，来吸纳中西人学思想精华，因而它是以当代中国现实为根基、在同世界人学和中国传统人学对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必将重演近代西方人学的某种历史剧。然而，中国毕竟面临着当代全球性问题，也具有自己特有的历史方位、特殊国情及其“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学的内容和形式就不能重复西方人学的过去了，其人学历史剧必定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与中国风格。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发展时序的差距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定位，致使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难以达到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语境的相同话语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虽有许多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并不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因而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文化基础。我们只能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来建构当代中国的人学。

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学研究一开始就是力求通过对完整的人的综合思考，旨在寻求哲学、科学、文化和人文精神之本，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哲学观、科学观和文化观，为当代哲学发展提供方向；就是走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洞察人的生存体验，关心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人类发展的命运；就是既要从价值观上重视人，又要在学理上完整论说人，还要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许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不了解“人”所造成的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对待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应在价值观上把人当人和主体看，正确发挥主体的作用。近年我国人学研究的意图之一，就是唤醒对“人”的自觉尊重，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但它必须通过对“人”的科学理解来为尊重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人学研究

的这种意图不可低估。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决策层之所以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其原因之一,正是我国人学研究积极倡导要理解人、重视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要真正尊重人和正确发挥人的作用,还要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即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人格上的真正彻底的塑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式的、旨在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在人的内心深处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格塑造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在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了,因而,全面彻底实行人格塑造就成为当务之急。

研究的成果及其作用和影响——据中央党校哲学部资料室不完全统计,自1985年至2001年,我国发表的相关人学文章有2900多篇,相关专著130多部。2001年以后,论著不断增多。这些论著在决策、实践和学术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第一,为人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它提出的一些创新性观点,建立起了哲学与人的本质联系;提出了“人学”的一系列范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新兴学科来建设,确立了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合法地位;总结了以往人的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对人性的理解与社会历史、对科学、对文化、对哲学理解的内在联系,从而强调当代哲学要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第二,在理论建设上有助于深化对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发展理论、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的研究。第三,在现实上反映了世界潮流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形成了一种关注人、尊重人和塑造人的人学思潮,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和人的塑造,推进和加强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文化建设、素质教育、管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现代化进程等。

研究的特征及其不足——中国的人学研究着重从哲学学理层次上把握“完整的人”,而在为时代和中国实践发展提供人学理念方面做得不够,在同其他学科交流合作方面也显得不够;着重从学术理论上探讨

人的问题,而在使人学走出书斋,“下”到同平民大众的生活世界相结合从而被他们所掌握,“上”到同决策部门相结合从而为决策提供根据,做得还不够,致使哲学学术圈外的人士不知“人学”所云;多在学科边界、人学对象、人学观念比较模糊的情境下进行,这利于学者们打破“框框”束缚,大胆探求问题,但也使一些学者把远不是人学的问题当作人学问题来“经营”;多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和自觉的态度进行研究,但研究中的主观评判色彩、盲目自发的模仿倾向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

研究的趋势——如果把发展中的中国人学思潮放在知识经济时代来考察,必将发现,21世纪新的社会实践又进一步使哲学走向人,也使人进入哲学视野的中心。由此,人学就必须由20世纪末的“热身型”研究阶段转向“攻坚型”研究阶段,人学研究必须承载四大历史使命:一是清理与总结工作。即对相关的研究成果、理论前沿、前提性问题、学术动态进行系统深入的清理与分析。二是倡导与推动工作。即学界和社会要进一步积极推动和倡助人学研究;要在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中,在对中、西、马文化精华的汲取中,在对人的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在对人的哲学理解中,提升并确定当代中国人学的核心理念。三是转型工作。就是实现人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由清理与总结以往的思想资源和经验教训,转向为建构人学大厦奠定根基;由推动与倡导工作,转向提升人学的核心理念,力图为21世纪中国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并实行社会体系创新;由对“完整的人”的追求,转向建构“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塑造“完整的人”的人格,力求使人学作为一门研究“完整的人”的科学真正建立起来;由“我思”、“哲思”和“离思”,转向“我思”和“集思”、“哲思”和“科思”、“离思”和“合思”相结合;由模糊走向精确,真正厘定人学的学科边界、人学的对象、人学的性质;由不知走向知,加强对各门人的科学以及对人的科学加以综合的方法的理解和把握,提高人的综合创新能力;由过于对人学的学理、学科的关注,转向人学的学理与思想并重,人学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并重,尊重人、说清人、塑造人并重;由注重国内哲学学术领域的人学研究走向开放,既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同世界对话,又同其他相关学科结成联盟,还要使“人学”进